

## 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罗]盖·扎曼 尤·莫·奥埃赫列亚 - 欣卡伊 李丹琳 译

**【内容提要】** 现阶段,依照绿色投资原则(GIP),中国特别重视“一带一路”倡议下项目的可持续性,重点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债务”。绿色投资原则与“环境、社会 and 治理投资”(ESG investment)<sup>①</sup>相关联,“环境、社会 and 治理投资”是当今社会使用越来越频繁的术语,作者将新技术(Technology)因素加入其中,成为“ESTG”,表示既要考虑环境、社会 and 治理方面的因素,又要考虑新技术的作用。这反映了从“单一价值驱动”投资向“多元价值驱动”投资的逐步转变过程,意味着在公司或国家投资时,利润不再是考虑的唯一标准,应综合考虑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这种转变强调的是,除了股东之外,还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大众媒体、政府部门、多边组织和地方团体)、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以及声誉问题。近几年,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这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史以来实施的伟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搭建新的舞台。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债务 绿色投资原则

**【作者简介】** 盖·扎曼,罗马尼亚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尤·莫·奥埃赫列亚 - 欣卡伊,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简介】** 李丹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法学博士。

---

<sup>①</sup> ESG投资起源于欧美。2006年,联合国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致力于推动各大投资机构在投资决策中考虑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因素——译者注

## 一 引言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近7年时间里,针对该倡议的分析和研究——其目的、机制、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和风险已经在有关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文献中有所论述。

“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和包容的,它的目标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该倡议已经被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今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相关工具。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目标,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蕴藏着机会,但也有潜在的风险。根据 J. 彼尔德(J. Bird)、M. 勒布兰德(M. Lebrand)和 A. J. 维内布莱斯(A. J. Venables)2019年发表的文章,“一带一路”倡议为改善各方相通作出了较大贡献,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例如,为当地生产者和工人提供了新机会,使他们能更好地进入市场,更好地与供应商沟通;进口价格下降,有助于增加实际收入;运出口成本降低,增加了本地生产需求;提高了区域生产专业化,扩大了规模经济和集群经济,因此提高了生产率<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研究调查了中国自由贸易协定(TAs)与伙伴国家在全球价值链(GVCs)中地位升级之间的关系。例如,彭飞等人在2020年撰文强调:第一,与没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相比,已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家更有可能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第二,在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存在纵向和横向溢出效应;第三,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中端的伙伴国家可能比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国家更能从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sup>②</sup>。

关于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潜在风险,M. 鲁塔(M. Ruta)在其2018年发表的文章中强调了3点。第一,“政策壁垒制造了层层边界”。因此,基础设施项目必须在政策改革和辅助的辅助下促进联通性,特别是那些对贸易

---

<sup>①</sup> J. Bird, M. Lebrand, A. J. Venabl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in Central A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807, Social, Urban, Rural and Resilience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Group, 2019.

<sup>②</sup> Peng F., Lili Kang, Liu T., Cheng J. and Ren L., Trade Agreeme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New Evidence fro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 MDPI, Vol. 12(4), February, 2020, pp. 1 - 24.

和投资有限制性政策的国家。第二,还存在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潜在的环境、社会和腐败风险”,且“这些风险在某些治理薄弱的国家中可能尤其巨大”。第三,“‘一带一路’项目使某些国家的债务扩大到不可持续的水平”<sup>①</sup>。因此,世界银行专家建议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MDBs)可以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已与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银行和丝路基金,还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

与上述目标互补,并且与多边开发银行紧密相连,作为“边做边学”过程的直接结果,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倾向于如下方向。

第一,使“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化”并避免那些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或对中国形象有潜在影响的项目(关键词为环境);

第二,将社会需求和期望因素考虑进去(关键词为社会);

第三,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而实施新的工业革命,以此作为进步之路(关键词为技术);

第四,解决主要的治理弱点和挑战(关键词为治理)。

以上4个关键词的首字母缩写“ESTG”代表了本文的主题。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强调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特征和新的原则,并通过“ESTG”的各个组成部分将这些特征和原则进一步扩展。这种提法比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体现的“共赢”原则更为清晰,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带入成功之路。

##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

影响深远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特色,使其在众多国际倡议中与众不同,并由此塑造了其独特性。它以振兴为开端,将伙伴国家的发展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考虑进去,旨在实现古代“丝绸之路”的宏伟前景。在国际合作框架内“一带一路”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一带一路”是一个地域设计极其广阔的倡议,不仅涵盖亚、欧、非

---

<sup>①</sup> M. Ruta, Three Opportunities and Three Risk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orld Bank, Trade Post, May 4, 2018.

3 个大陆,还有明显的更广阔视野。这是一项具有广泛地理意义的举措,不仅遍及三大洲(亚洲、欧洲和非洲),而且具有明显的扩大前景。例如,尽管最近新西兰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但其仍是坚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之一<sup>①</sup>。另外,本文作者提出“一带一路一圈”的概念,认为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将涵盖北极<sup>②</sup>。

第二,根据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原则,“一带一路”倡议在得到一致赞同的基础上提供了多边合作的愿景。它还是一个协作平台,在寻求用机器人和自动化逐步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找到解决方案。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机构和工具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其框架内的一个最新组织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立于2018年,其主要目标是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聚焦“一带一路”区域共性挑战,促进各国科技创新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共同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合作计划;推动创新能力的相互开放合作和创新资源、数据的开放共享;加大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力度,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即实施科学、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STIC)计划,以促进共同发展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p>③</sup>。强调技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数字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机器人、自动化、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超级平台等。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所说的实现多边合作不会进行机构一体化或实行一系列强制性规则,它同时具有产生双赢效应的巨大潜力。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也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这样可以利用资本优势达到经济互补。这种互补性不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考虑,也从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活动的功能优化角度来考虑。换句话说,它为全球化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方法。这不同于满足二战后重建需求的马歇尔计划,而是一个灵活的平台,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解决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气候变化的影响,经

① P. Köllne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ecalibrate Their China Policie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The Pacific Review*. 07 Nov. 2019.

② Huang Y.,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0, 2016, pp. 314 - 321;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IFC Annual Report 2019*, Washington D. C.

③ 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http://www.anso.org.cn/about/anso>

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的不平等,长期的贫困问题,恐怖主义,军事冲突,移民问题,种族隔离和歧视等。

第五,“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时间跨度的项目,它既适合某些特定领域,也适合整个经济和社会,同时还能够满足基于目标治理的战略方针的各项要求。

第六,“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经济模式成功地向竞争性和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机制过渡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熊彼特理论所说的在辩证法中偏向创造性载体,而不是破坏性载体的创造性破坏概念。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最吸引人和令人鼓舞的还有一些有益的经验,即公共资本之间的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以及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减少贫困(贫困是极具“污染性”的因素,能在全世界制造最严重的紧张局势)为全球提供最全面的公共产品网络。

第七,“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背景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它将可持续发展的各个子支柱有效统一起来:经济(达到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增强包容性、凝聚力、团结和社会正义、公平和责任感)、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态效率)、文化以及区域均衡发展。

第八,该倡议通过多学科、学科间、学科内和跨学科方式探析和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危机管理、脆弱性和弹性从线性向非线性(或概率)转变。

第九,中国的合作伙伴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将双边合作与区域和多边框架所提供的优势结合起来。例如,一方面,罗马尼亚是欧盟成员国,它可以诉诸欧盟(涉及特定的义务和权利);另一方面,罗马尼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它也可以诉诸“17 + 1 合作”平台。罗马尼亚在市场规模、资源、劳动力、金融环境和地理位置(它跨越3条主要的泛欧洲走廊,即泛欧洲4号走廊、泛欧洲7号走廊和泛欧洲9号走廊)<sup>①</sup>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中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始终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者的现在,还是在没有加入这一具有深远意义倡议的30年前,罗马尼亚都没有与中国合作实施过任何大规模的项目,但是,中国没有忘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两国成功的双边合作。双方仍在等待潜在的富有成果的项目。

---

<sup>①</sup> Yu 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omani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listica*, Vol. 9, issue 3, 2018, pp. 33 - 44.

### 三 “一带一路”需要更强有力的理论方法

#### (一)“一带一路”倡议曾经缺少的环节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共赢特点定义了“丝绸之路精神”<sup>①</sup>；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sup>②</sup>。尽管如此，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无论标题如何，都指出了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若干风险。黄益平在 2016 年撰文指出，该倡议的实施有很大的挑战性。“一带一路”覆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多边协调机制，如果都通过双边关系来谈判合作，成本过高，协同效应很低；另外，存在不同政治制度和信仰的潜在冲突以及跨境项目的财务可行性问题<sup>③</sup>。如果这些风险被发达国家标记为诸如债务陷阱、对经济不利的做法、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遵守国际标准和准则或挤出效应等较不友好的标签，则应该认真对待。程好在 2018 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与各国对中国的看法有关，也与各国政府是否应加入该倡议的舆论有关<sup>④</sup>。

根据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中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1 月，共有 137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协议。2013 ~ 2019 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或提供信贷总额约为 7 300 亿美元。其中数额最多的领域为能源(39%)和交通运输(26%)；投资数额最多的地区依次为东亚(25%)、撒哈拉以南非洲(22%)、西亚(21%)和中东(15%)<sup>⑤</sup>。

尽管存在一些激烈的批评，但“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没有停止。但由于新冠肺炎暴发及蔓延，该倡议现在已接近停滞。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克服当前困难形势，特别是目前存在的危机之后，重

① I. M. Oehler - Şincai, How Do BRI Narratives and Actions Impact Cooperation Relations and Partnerships Worldwide? *Global Economic Observer*, Vol. 7, No. 2, 2019, pp. 275 - 282.

②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 年 3 月（经国务院授权发布）。

③ Huang Y.,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0, 2016, pp. 314 - 321.

④ Cheng Y.,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ross Cultural Study, in: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Arena, Chi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Cheng Y., Song L., Huang L. (eds.),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3 - 15.

⑤ <https://green-bri.org/belt-and-road-initiative-quick-info>

点应放在将以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原则为指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上。

由于存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误解,对“一带一路”倡议中成功项目的反响要比失败项目的反响弱得多。这本身就是一种感知风险。此外,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多数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应考虑与共同使用公共产品效应相关的理论。因此,经过对“一带一路”倡议中正在进行谈判和实施的项目以及与其中某些项目有关的批评(通常与心理因素有关)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大规模的长期计划必须与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的通用原则紧密结合。这是本文通过对各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后所提供的建议。

## (二)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共赢的概念还不够清晰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几点:从实践和操作的角度看,双边和多边合作中每个参与者的优势和成本的衡量标准还不够明确。简而言之,如何应用共赢模式达到最佳或至少所谓的折中方案?在这方面,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效率公式(Ef)来更具体地表达各方利益的相互性、互惠性和等价性,该效率公式是成果(效果、产出、收益)与努力(成本、支出)之间的比率: $Ef = R/E$ 。如果每个合作伙伴的效率几乎相等,那么就可以获得成功且互利的合作,即 $Ef_1 \approx Ef_2, \dots \approx Efn$ (n代表合作伙伴数量)。

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前景、项目实施伙伴的经济状况和潜在风险(如社会、经济、环境、地缘政治或医疗风险)。此外,效率还取决于合作伙伴的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同的效率水平意味着并非所有合作伙伴都能平等获利。

当一个项目有多个参与者时,贡献较小的参与者收益较少,与此相适应,贡献更多的参与者应获得更多的收益。根据比例原则和等价原则,从财务角度讲,每个合作伙伴的成果与努力的关系必须几乎相同。实际上,这是在教科书上所确定的财务对等或效率。

除了财务效应外,还存在溢出效应,即正/负外部效应,外部效应以3个时间维度显现,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关于外部效应,存在3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恒定的外部性,不考虑输入值;第二,上升的外部效应,在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最危险;第三,在给定一段时间后减少甚至消失。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是并存的。例如,如果农用土地面积减少,那么,新建高速公路就产生了负外部效应。而正外部效应包括:减少运输时间、在工业区追加投资、刺激贸易和吸引更多游客。除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外,财务对等表明不

同类型外部效应(正和负)的均质化,因此,适当的贴现率对于与双方都相关的国际合作来说就是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项目存在潜在的漏洞和风险,那么,与在实施过程中或项目完成后出现副作用的“赔偿”相比,预防更为可取。预防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增加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缺乏预防措施,最终的成本可能会高于预期,包括形象方面的成本。在无法避免风险的情况下,应建立相应的应对模式,这是对冲击、风险和危机的适应力。与物理现象相似,这种适应力可以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也可能不具备这种适应力。适应力可以被定义为对冲击的抵抗力,如果快速恢复到先前、危机前或上一级,则适应速度很快,否则适应速度会很慢。

因此,用每个参与者都能赢得平等这样的概念理解,共赢原则从一开始就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人赢得更多,而另一些人赢得较少。因此,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方法。

#### 四 “一带一路”下的中国绿色投资原则是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一带一路”的起点

2018年11月底,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在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该原则从战略、运营和创新3个层面制定了7条原则性倡议,包括公司治理、战略制定、项目管理、对外沟通以及绿色金融工具运用等,供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见表1)。呼吁贷款方、投资者和公司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确保“一带一路”的新投资项目兼具环境友好、气候适应和社会包容等属性,以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将7个绿色投资原则与环境、社会 and 治理相关联,环境、社会 and 治理是旧术语,但在当今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说明环境、社会 and 治理问题已经纳入考虑的范畴。

<sup>①</sup> Ma J., Greening the Belt and Road Is Essential to Our Climate's Future, World Economic Forum, July,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7/belt-and-road-climate-future-changegreen>

表 1 “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投资原则

原则清单	原则一: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
	原则二:充分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
	原则三:充分披露环境信息
	原则四: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原则五: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工具
	原则六: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
	原则七:通过多方合作进行能力建设
起草原则的主要参与方	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伦敦金融城”、“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绿色“一带一路”投资者联盟、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秘书处	在北京和伦敦各设有一个绿色投资原则秘书处

资料来源:<http://www.gflp.org.cn/public/ueditor/php/upload/file/20181201/1543598660333978.pdf>;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7/belt-and-road-climate-future-change-green/>; [https://www.db.com/newsroom\\_news/2019/greening-china-s-belt-and-road-en-11480.htm](https://www.db.com/newsroom_news/2019/greening-china-s-belt-and-road-en-11480.htm)

注:2019年4月25日,中国在北京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有27家金融机构签署了绿色投资原则,包括如下国家和地区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蒙古国。同时,其他主要机构也参加了会议。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已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定义为考虑到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决策过程<sup>①</sup>,表明投资决策逐步从“单一价值驱动”过渡到“多元价值驱动”,意味着利润不再是公司或国家(地区)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唯一标准,必须同时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

此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环境、社会和治理应该将新技术(T)包括在内。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将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综合起来考虑有如下论据:第一,新技术对环境保护的作用;第二,劳动力需适应颠覆性的数字技术的需要,这不仅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好处,也带来压力;第三,产生了引导合作平台的一些因素,推动了网络发展、思想交流、研究、发展和创新;第四,加强了沟通和信任。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in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A Report for the Asset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 of the UNEP Finance Initiative, October, 2005, p. 18.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2016 年的观点认为<sup>①</sup>,成功实现工业 4.0 的原则应集中在:第一,“制度上而非技术上,因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将是对商业、社会和政治的广泛变革,而不仅仅是为了技术本身所要获取的利益”;第二,赋予我们的社会掌握技术并对人类进步的宿命论和决定论采取行动的权力;第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必须在我们整合这些革命性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第四,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不是加剧不安全感并制造混乱的局面(即减少差距、贫困、歧视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些远远超出了 K. 诺萨尔斯卡(K. Nosalska)和 G. 马祖雷克(G. Mazurek)在 2019 年概述的原则:合作、对话、共创、凝聚力和连通性<sup>②</sup>。

## 五 风险的程度

为了成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部分项目,有必要考虑全球风险的可能性或概率及其潜在的影响。所暴露的风险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风险程度 = 风险可能性 × 潜在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 2020 年编制的数据库是评估“一带一路”倡议下各个项目所暴露的风险程度的有用工具。表 2 ~ 4 列出了 2007 ~ 2020 年风险程度的可能性,表 5 ~ 7 列出了 14 年中潜在影响的强度。

表 2 2007 ~ 2020 年全球风险的可能性

年份	5 级风险可能性(最高)	4 级风险可能性	3 级风险可能性	2 级风险可能性	1 级风险可能性(最低)
2007	技术	社会	经济	经济	经济
2008	经济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经济	社会
2009	经济	经济	社会	地缘政治	经济
2010	经济	经济	社会	经济	地缘政治
2011	环境	环境	地缘政治	环境	环境

① K. Schwab, Four Leadership Principles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October 11, 2016 .

② K. Nosalska, G. Mazurek, Marketing Principles for Industry 4.0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Production and Services, vol. 11, issue 3, 2019, pp. 9 – 20.

(续表 2)

年份	5 级风险可能性(最高)	4 级风险可能性	3 级风险可能性	2 级风险可能性	1 级风险可能性(最低)
2012	社会	经济	环境	技术	社会
2013	社会	经济	环境	社会	社会
2014	社会	环境	经济	环境	技术
2015	地缘政治	环境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经济
2016	社会	环境	环境	地缘政治	环境
2017	环境	社会	环境	地缘政治	技术
2018	环境	环境	技术	技术	环境
2019	环境	环境	环境	技术	技术
2020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20 年数据库整理而成。

表 3 2007 ~ 2020 年全球风险可能性介绍

风险可能性	风险可能性介绍
5 级	1 × 技术(基础设施故障);3 × 经济(1 × 资产价格暴涨,2 × 资产价格崩溃);5 × 环境(1 × 暴风雨和飓风,4 × 极端天气);4 × 社会(3 × 收入差距,1 × 非自愿迁移);1 × 地缘政治(地区冲突)
4 级	2 × 社会(1 × 慢性疾病,1 × 非自愿迁移);1 × 地缘政治(中东不稳定);4 × 经济(2 × 中国经济放缓,2 × 财政不平衡);7 × 环境(1 × 洪水,3 × 极端天气,1 × 自然灾害,2 × 气候破坏);0 × 技术
3 级	2 × 经济(1 × 石油价格休克,1 × 失业);3 × 地缘政治(1 × 国家衰败或正在衰败,1 × 腐败,1 × 国家治理失败);2 × 社会(2 × 慢性疾病);6 × 环境(2 × 温室气体排放,1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3 × 自然灾害);1 × 技术(网络攻击)
2 级	3 × 经济(1 × 中国硬着陆,1 × 石油价格休克,1 × 财政危机);4 × 地缘政治(1 × 全球治理差距,1 × 国家崩溃或危机,1 × 国家间冲突,1 × 恐怖主义袭击);3 × 环境(2 × 生物多样性丧失,1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1 × 社会(1 × 水危机);3 × 技术(2 × 网络攻击,1 × 数据欺诈或盗窃)
1 级	3 × 经济(1 × 资产价格暴涨,1 × “去全球化”,1 × 失业);3 × 社会(1 × 慢性疾病,1 × 水危机,1 × 人口老化);1 × 地缘政治(1 × 全球治理差距);4 × 环境(1 × 气候变化,1 × 自然灾害,1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1 × 人为环境灾难);4 × 技术(3 × 网络攻击,1 × 数据欺诈或盗窃)

资料来源:同表 2。

**表 4** 2007 ~ 2020 年全球风险可能性数值(绝对值,%)  
(每个类别的风险可能性乘以风险级数)

最高级 5 级	技术(5) + 经济(15) + 环境(25) + 社会(20) + 地缘政治(5) = 70 各项比率:技术占 7.1%、经济占 21.4%、环境占 35.7%、社会占 28.6%、 地缘政治占 7.1% 级别自高而低:环境、社会、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技术和地缘政治级别 相同)
4 级	社会(8) + 地缘政治(4) + 经济(16) + 环境(28) + 技术(0) = 56 各项比率:社会占 14.3%、地缘政治占 7.1%、经济占 28.6%、环境占 50%、技术占 0 级别自高而低:环境、经济、社会、地缘政治、技术
3 级	经济(6) + 地缘政治(9) + 社会(6) + 环境(18) + 技术(3) = 42 各项比率:经济占 14.3%、地缘政治占 21.4%、社会占 14.3%、环境占 42.9%、技术占 7.1% 级别自高而低:环境、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经济和社会级别相同)、 技术
2 级	经济(6) + 地缘政治(8) + 环境(6) + 社会(2) + 技术(6) = 28 各项比率:经济占 21.4%、地缘政治占 28.6%、环境占 21.4%、社会占 7.1%、技术占 21.4% 级别自高而低: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经济、环境和技术级别相 同)、社会
最低级 1 级	经济(3) + 社会(3) + 地缘政治(1) + 环境(4) + 技术(3) = 14 各项比率:经济占 21.4%、社会占 21.4%、地缘政治占 7.1%、环境占 28.6%、技术占 21.4% 级别自高而低:环境、经济、社会、技术(经济、社会和技术级别相同)、地 缘政治

资料来源:同表 2。

关于风险的可能性,人们注意到环境风险在时间上是有变化的,同样,在影响程度上也是有变化的,但是在影响程度上,社会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程度巨大。技术风险的影响仅在 2014 年出现一次,与潜在的基础设施崩溃有关。有几种情况,同一风险包含在两个不同类别中。例如,收入差距既表现为经济风险,也表现为社会风险;“去全球化”既表现为地缘政治风险,也表现为经济风险;而水危机表现为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在本文的分析中,一种风险只能归于一类,我们将收入差距定义为社会风险,将“去全球化”定义为经济风险,将水危机定义为社会风险。

**表 5 2007 ~ 2020 年全球风险的影响**

年份	5 级风险影响(最高)	4 级风险影响	3 级风险影响	2 级风险影响	1 级风险影响(最低)
2007	经济	经济	地缘政治	社会	经济
2008	经济	经济	经济	经济	社会
2009	经济	经济	经济	社会	经济
2010	经济	经济	经济	社会	经济
2011	经济	环境	地缘政治	经济	经济
2012	经济	社会	社会	经济	经济
2013	经济	社会	经济	地缘政治	环境
2014	经济	环境	社会	经济	技术
2015	社会	社会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环境
2016	环境	地缘政治	社会	社会	经济
2017	地缘政治	环境	社会	环境	环境
2018	地缘政治	环境	环境	环境	社会
2019	地缘政治	环境	环境	社会	环境
2020	环境	地缘政治	环境	环境	社会

资料来源:同表 2。

**表 6 2007 ~ 2020 年全球风险的影响介绍**

风险的影响	风险的影响介绍
最高级 5 级	8 × 经济(2 × 资产价格暴涨,2 × 资产价格崩溃,2 × 财政危机,2 × 金融风险);1 × 社会(水危机);2 × 环境(2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3 × 地缘政治(3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4 级	4 × 经济(4 × “去全球化”);5 × 环境(1 × 气候变化,2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2 × 极端天气);3 × 社会(2 × 水危机,1 × 传染性疾病);2 × 地缘政治(2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 级	3 × 地缘政治(1 × 国家间和国内战争,1 × 地缘政治冲突,1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4 × 经济(1 × 中国硬着陆,1 × 油气价格暴涨,1 × 石油价格暴涨,1 × 财政不平衡);4 × 社会(1 × 粮食危机,3 × 水危机);3 × 环境(1 × 自然灾害,1 × 极端天气,1 × 生物多样性丧失)
2 级	5 × 社会(1 × 流行病,2 × 传染性疾病,1 × 非自愿迁移,1 × 水危机);4 × 经济(1 × 石油价格休克,1 × 资产价格崩溃,1 × 财政不平衡,1 × 失业);2 × 地缘政治(1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 × 国家间冲突);3 × 环境(1 × 自然灾害,1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1 × 极端天气)
最低级 1 级	6 × 经济(1 × 石油价格休克,2 × 财政危机,2 × 能源价格波动,1 × 能源价格休克);3 × 社会(1 × 流行病,2 × 水危机);4 × 环境(3 × 气候行动计划失败,1 × 自然灾害);1 × 技术(1 × 基础设施故障)

资料来源:同表 2。

表 7 2007 ~ 2020 年全球风险潜在影响数值(绝对值,%)  
(每个类别的风险潜在影响乘以风险级数)

最高级 5 级	经济(40) + 社会(5) + 环境(10) + 地缘政治(15) + 技术(0) = 70 各项比率:经济占 57.1%、社会占 7.1%、环境占 14.3%、地缘政治占 21.4%、技术占 0 级别自高而低:经济、地缘政治、环境、社会、技术
4 级	经济(16) + 环境(20) + 社会(12) + 地缘政治(8) + 技术(0) = 56 各项比率:经济占 28.6%、环境占 35.7%、社会占 21.4%、地缘政治占 14.3%、 技术占 0 级别自高而低:环境、经济、社会、地缘政治、技术
3 级	地缘政治(9) + 经济(12) + 社会(12) + 环境(9) + 技术(0) = 42 个 各项比率:地缘政治占 21.4%、经济占 28.6%、社会占 28.6%、环境占 21.4%、 技术占 0 级别自高而低:经济、社会(经济和社会级别相同)、地缘政治、环境(地缘政治 和环境级别相同)、技术
2 级	社会(10) + 经济(8) + 地缘政治(4) + 环境(6) + 技术(0) = 28 各项比率:社会占 35.7%、经济占 28.6%、地缘政治占 14.3%、环境占 21.4%、 技术占 0 级别自高而低:社会、经济、环境、地缘政治、技术
最低级 1 级	经济(6) + 社会(3) + 环境(4) + 技术(1) + 地缘政治(0) = 14 各项比率:经济占 42.9%、社会占 21.4%、环境占 28.6%、技术占 7.1%、 地缘政治占 0 级别自高而低:经济、环境、社会、技术、地缘政治

资料来源:同表 2。

表 8 全球风险可能性和潜在影响的数值

可能性和潜在影响	可能性数值	影响数值
最高级 5 级	环境(25)、社会(20)、经济(15)、 地缘政治(5)、技术(5)	经济(40)、地缘政治(15)、环境 (10)、社会(5)、技术(0)
4 级	环境(28)、经济(16)、社会(8)、地 缘政治(4)、技术(0)	环境(20)、经济(16)、社会 (12)、地缘政治(8)、技术(0)
3 级	环境(18)、地缘政治(9)、经济 (6)、社会(6)、技术(3)	经济(12)、社会(12)、地缘政治 (9)、环境(9)、技术(0)
2 级	地缘政治(8)、经济(6)、环境(6)、 技术(6)、社会(2)	社会(10)、经济(8)、环境(6)、 地缘政治(4)、技术(0)
最低级 1 级	环境(4)、经济(3)、社会(3)、技术 (3)、地缘政治(1)	经济(6)、环境(4)、社会(3)、 技术(1)、地缘政治(0)
总计	环境(81)、经济(46)、社会(39)、 地缘政治(27)、技术(17)	经济(82)、环境(49)、社会 (42)、地缘政治(36)、技术(1)

资料来源:同表 2。

从表 8 看出,就可能性而言,环境和经济风险数值最高,按照这个顺序,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力最大。社会、地缘政治和技术风险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如环境和经济风险的影响力大。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在区域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性的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在减轻前面提到的所有类别的风险方面负有极大的责任。这些国家的竞争能力、劳动力、技术资产、研发和创新能力以及其他资源,还有他们对供求的影响力,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面提到的全球风险对所有国家而言都具有挑战性,尤其对那些具有较高能力和行动力的国家而言更具挑战性。这些国家,不论是中型还是小型国家,它们不仅自身具有遭遇外部冲击后的修复能力,而且也对其他国家遭遇外部冲击后的恢复有所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向至少3个大洲开放意味着能够帮助每个参与者迅速恢复,有助于他们自由意志的恢复,而他们的自由意志仅受相互合作利益的约束。

## 六 结 论

本文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性、对国际合作的贡献以及在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方面缺乏考虑情况下的潜在脆弱性和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性在于为所有合作伙伴提供选择的自由,而不强加共同的规则。我们认为,如果每个合作伙伴的效率几乎相等,互惠就可以做到。在一个由多个参与者加入的项目中,贡献多的参与者应获得更多,贡献少的参与者获得较少。根据对等和等价原理,从财务角度看,每个合作伙伴的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几乎相同。

同时,任何项目都有潜在的风险。本文强调预防比在项目实施期间或之后出现副作用再进行修复重要得多,虽然预防对中国来说意味着花费更多的费用。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制定了基于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原则。中国应拒绝任何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并损害自身形象(关键词为环境)的项目。它应不断考虑社会需求和期望(关键词为社会)并利用新的工业革命(关键词为技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这样就更有能力应对内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弱点(关键词为治理)。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首先,将人与环境置于每个项目的中心;其次,从对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作贡献的角度来规范治理和技术,这样,“一带一路”倡议才会更加成功。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施环境、社会、技术和治理框架内的项目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行动。

(责任编辑:农雪梅)